第5期

一以内蒙古东部、安第斯山北部和美洲中部三个地区为例

「美〕周 南,柯睿思

(匹兹堡大学 人类学系,美国 匹兹堡 PA15620)

摘 要:对内蒙古东部、安第斯山北部和美洲中部三个地区的早期酋长制群体的聚落形态进 行的比较研究表明,尽管这三个地区的发展过程大致相当,但在这三个地区中,大体类似的转变 却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从而导致了三个各具特色的等级社会的出现。最初的、大规模的、以等级 制度原则组织起来的酋长制群体出现后,其发展轨道的早期阶段明显地为后来的、较大的、更复 杂的政治实体即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通过地域性聚落分析,可以发现这三个地区在不同规模 层次上的人口和社会组织的异同,其中在赤峰和奥哈卡(Oaxaca)地区都存在的小型群体却不见 于马格达雷那高地 (Alto Magdalena) 的现象,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揭示出在马 格达雷那高地是什么样的社会交流把这些家庭联合成更大的社会团体。

关键词:赤峰地区;马格达雷那高地;奥哈卡谷地;早期酋长制社会;聚落形态;社会组织 文章编号: 0257-2834(2004)05-0015-17 中图分类号: C912. 4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等级区别是酋长制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出现于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多脱胎于较早 的、较平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中。这些社会组织形式是最早的定居农业群体的典型的社会组织形 式。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早期酋长制社会和另一个地区的早期酋长制社会完全相同,但是它们都 代表了各自地区中较固定的、有极强社会等级区别的社会关系的早期发展。在这些社会中,那些 将成为酋长者比较成功地锻造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了其群体的基本组织原则的转 变。经历了这种转变的群体在不同的社会和空间规模上都有存在。我们通常认为,彼此有日常性 的面对面交流的小型群体栖生于略高于它的群体之内,而这个略高层次群体又栖生于更高层次的 群体内。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酋长制社会的出现代表了一种较大的、比从前融合更紧密的群体 的出现。规模最大的酋长制社会可地跨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囊括数千人口。探索导致这种转变的 社会力量之实质的方法之一便是研究这些群体的异同及它们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出现方式。为了研 究这些异同关系,我们必须能够以一种可靠的、有可比性的方式来识别和界定不同地域的群体。 地域性的聚落形态研究为描述和比较这些群体提供了一种方法,因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人类

收稿日期: 2004-07-05

基金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及核心研究发展基金项目;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周 南 (Robert D. Drennan) (1947-), 男,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教授; 柯睿思 (Christian E. Peterson) (1975-), 男,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https://www.cnki.net

内蒙古东部赤峰地区

赤峰地区位于温带,海拔高度适中(图1),气候冬冷夏热,降雨多集中于夏季,降雨量已 不能满足该地区大量的分布于绵延起伏的丘陵地上的非灌溉农业。不过在该地区平坦河谷的肥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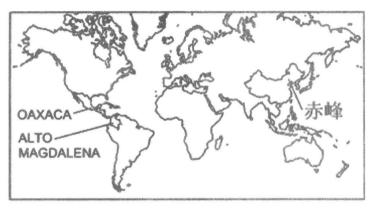


图 1 本文进行比较的三个地区的位置

沉积层上可以有充分的灌溉, 可 以显著提高农业产量。尽管一些 古代聚落遗址可能已被河谷地中 较新的沉积物掩埋, 在地表上看 不到有古代遗物散布, 但在大多 数遗址的地表,都可以清楚地看 到散布着遗物, 因此该地区具有 研究聚落形态的优越条件。

一般认为中国东北地区社会 组织的复杂形态出现于红山文化 时期 (距今约6500-5000年)

[1-8]。那些如玉雕和精绘的彩陶等令人叹为观止的器物,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组织提供了间 接证据,因为这些器物一定出于专门的手工业者之手。玉雕及其他特殊手工艺品有时也作为随葬 品埋葬,而其墓主能得此殊荣也正反映了一定规模的社会不平等性,尽管产生这种社会等级划分 体系的原因和本质还有待研究[3][5-6][9-12]。还有那些可能用于宗教或非宗教仪式中的颇具 规模的建筑,则暗示只有将大量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才能以成其举:同时这也暗示小型群体具有 一定程度的集权性,方可以成其用[3][12][13-16]。尽管目前"国家"一词被用来形容整个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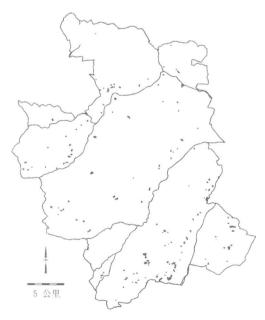


图 2 赤峰地区采集到红山文化陶片的地点

山现象,这似乎是把红山文化看成一个单独政体 [3] [5] [17], 但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更 能明确的代表数目众多、更加地方性的政体或社 会,而其在体现人口规模及社会等级化的程度上, 也更接近于通常在比较人类学中用来描述早期复杂 社会的"酋长制社会"一词。在 1999 年到 2001 年 三年的田野考古调香中,赤峰国际联合考古研究项 目组在赤峰以西 76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收集了详细 的有关红山文化及其他时期聚落形态的信息「18-21]。这些信息为探索组成这个早期酋长制社会的 群体的性质奠定了基础。这种探索的一个关键理念 是:广而言之,在近距离内,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联 系要比在远距离内频繁。当然,现在随着通讯和交 通技术的不断进步,远距离的交流已非常的便捷。 我们与在中国、南美洲或墨西哥的同事们的联络其 至比和北美洲同事们的联络还要紧密。但是在技术

简单、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里,则更有可能通过比较聚落在不同地域的分布方式来发现社会相互交 流影响模式的线索。

图 2 显示了通过系统区域考古调查所发现的采集到红山文化陶片的地点。此图显示出这样一 种布局模式 词 众多的小聚落广阔地散布在这个地区,其中平坦谷底地带分布密集。现在这些河谷 • 16 •

的平坦地区,尤其是在西南——东北走向的西北部边缘,也是产量最高的农业区。在中国东北地区一些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为研究其定居的农业生活模式提供了直接证据 [3] [22-30]。如果把红山文化时期的彼此相互毗连但又与其他彼此毗连的遗址群分隔开的遗址群作为划分界定这些小聚落的最小单位,那么总共可划分出 160 个聚落。这种划分方式与传统的划分考古遗址的方式略有不同:如果在包含有不同时期遗存的大型的单个遗址中,仅在两个分开的地点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那么这个遗址将被划分成两个红山文化聚落。对这些聚落的人口进行粗略估算的方法我们已在别处谈及 [31]。由这些估算来看,最小的聚落不过是些单个家庭的孤立的农庄,最大的聚落则可能有 200 个居民。在所调查的 765 平方公里的面积里,红山文化时期的人口总数估计在 4 000-8 000 人之间,而此数据的变差之大也正反映了这些估算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一个比 765 平方公里小得多的地域完全有可能很容易地养活这些人口,而更集中的聚落分布也会更好地促进整个人口群之间的社会交流。从调查区一端走到另一端大约要一天时间,由此不难设想所有这些聚落彼此之间都具有着某种联系;但观其各个聚落在整个地区分布之广泛与零散,不难看出整个人口群之间的交流联系不会很频繁。

图 2 显示出空间上不相邻的各遗址趋向于彼此就近群聚,同时又同其他群聚相隔较远。对这些群聚的系统描绘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交流联系模式和群体形成提供了机会。Peterson 和 Dren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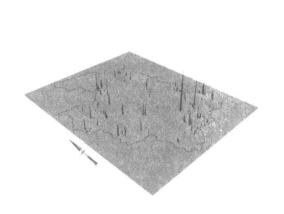


图 3 未经平坦化处理的赤峰地区红山 文化时期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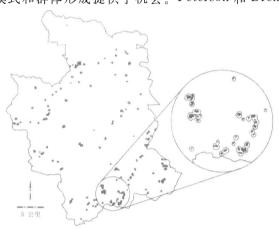


图 4 用等高线将图 3 中的遗址高峰的基底和周围的小遗址群聚合成的小型群体

提出使用基于赤峰地区地表遗存的面积和密度绘制的体现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31],作为描绘群体交流联系的基础。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的人口地形图 (图 3) 在体现人口分布上明显的优于图 2,因为图 2 仅体现了发现有红山文化遗存的区域,而图 3 还体现了发现的遗存的密度。较大而较稠密的红山文化遗址在图上突兀耸立似高峰,较小而较稀疏的遗址则微凸如小丘,对比鲜明。有时候,一个单个的高峰代表了几个邻近但不接壤的遗址。这种情况尤其见于较大而密集的遗址。此图采用了把在空间上邻近的遗址自然地群聚在一起的方式。如果通过等高线图 (contour map) 来表现此图,那么一个单个的、极低的等高线高度可被选来描廓代表红山文化遗址的高峰的基底,而这些高峰又从周围的平坦的(即未被居住的)地形中一跃而起。这条等高线常常几个空间上不相连的遗址归组成一个群聚(图 4)。以此方式聚合遗址,分开来的聚落总数降至 125 个。最小的遗址可能仅是一些单个家庭的孤立的农庄,较大的遗址可囊括几百居民。这些群聚说明在这种规模上的人们间的交流联系是建立在各个小型群体之上的,因为所有这些群聚最长不过 900 米,其成员彼此之间可能每天都有面对面的交流。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多群聚说明了其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是一些大小不一,但平均包括 10—12 个家庭的小型群体(local community)。这些家庭彼此可能有亲缘关系且分享日常生活活动。这些社会交流对红山文化家庭非常重要,使

他们都选择彼此在近距离内结邻而居, 而没有在紧挨着他们各自所耕种的田地边上居住。

红山文化聚落分布的群聚性特征在稍大的比例上显示也很明显。一些(并非全部)相邻小型群体形成组(groups)。为辨识在比这种小型群体更大规模上的社会交流结构,Peterson和Drennan以数学方式把代表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进行了"平坦化"处理。在经过平坦化处理的红山文化人口地形图上,代表遗址的高峰变得更大,其中一些高峰在从相对较平坦(即未被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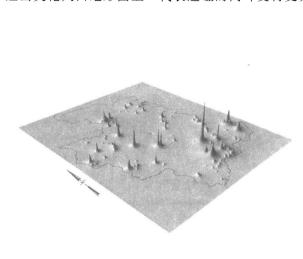


图 5 经过平坦化处理的赤峰地区红山 文化时期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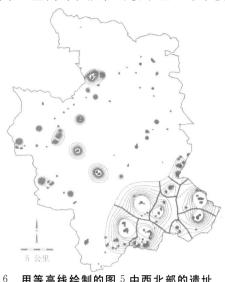


图 6 用等高线绘制的图 5 中西北部的遗址 高峰的基底以及东南部更加复杂的遗址 分布状态,并用粗线划分出不同的社区

过)的背景中隆起升高时,渐渐彼此融合在一起(图 5)。在此图上选用极低的等高线再次勾勒出了不同的居住群聚,尽管其模式更加复杂(图 6)。在调查区的北部和西部,尽管其中一些小型群体保持了其原有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但每个圆圈还是勾画出了那些已在不很"平坦"的地形图中得到识别的小型群体的群聚。在东南部,似乎可见到一个大的群聚(图 5),但事实上,同西部和北部的遗址高峰极相似的遗址高峰也出现在了东南部。只是由于这些高峰相隔较近,在经过了数学方式的"平坦化"处理后,"平坦"的基础地表都略有升高。因为"平坦"的基础地表在调查区东南部略高,我们可以选择高一点的等高线(也见于图 6)来界定这部分的 6 个主要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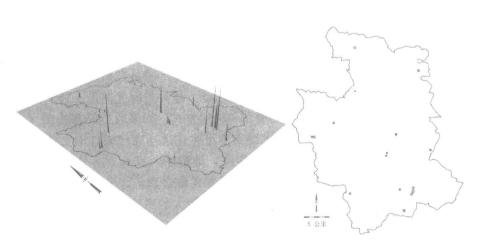


图 7 左图为未经平坦化处理的代表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右图为描绘遗址高峰基底和周围遗址聚合成小型群体的等高线图

址底将的在群调位高形6)代峰开峰,一型大之区这之 呈遗山的的这些群一外东两内上现址脉的基样零体点。南个的(出的分"础则散抛的在部等地图把高隔低础则散抛的在部等地图把高隔低

谷"。分布于东南部的大量的小而零散的聚落,明显地与这个或那个高峰群聚形成所谓"社区" (districts),即社会交流联系的单位,与西北部的大型群体相似,只是领土面积更大。

一共形成了65个小型群体的群聚,其中14个最大的群聚(估计人口超过150人)在人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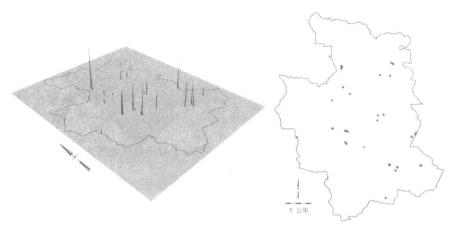


图 8 左图为未经平坦化处理的代表赤峰地区赵宝沟文化时期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右图为描绘遗址高峰基底和周围遗址聚合成小型群体的等高线图

遥群个示的的还的起的范进群等。大在面型在体并山内了。的有对群一结不文的这估于是群日面体种构是化居种计位内了。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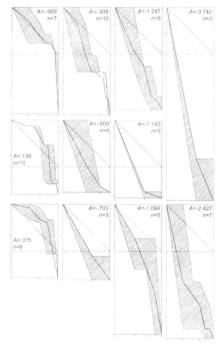
区人口的 1/4 居住在游离于大的群聚之外的 51 个小型群体中。大型群体则囊括了地区人口的 3/4。在大多数大型群体中,小型群体起到了建筑砖瓦的作用,因为大型群体是由不同的群聚构成的,而每个群聚又是由最多至 10 个的小型群体组成的。只有 2 个大型群体例外,它们由单个聚落组成,自成一体。一些群聚范围极大,从一端到另一端可达 3 公里,这种空间距离使群体之间无法产生日常性的、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将这些群聚的形成归因于各个群聚之内的小型群体彼此之间的较频繁的交流联系,而不是它们与这个群聚之外的群体之间的交流联系。

这种较高层次的结构的丰富性,在赤峰调查区内红山文化以前的聚落分布中并无体现。在赤峰地区,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始于距今约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约有300居民的人口(图7)形成了一个个小型群体,彼此之间比红山文化聚落分布更加分散。在调查区的几个地点,这些小型的兴隆洼文化的群体可三三两两划分成组,但其聚落数目之少,已无希望勾画出像红山文化时期那种复杂的、多层次的群聚。在接下来的赵宝沟文化时期(始于距今7250年),尽管人口总数仍徘徊在800-1600人之间,但仍表现出地域性增长。居住址仍广泛分布在调查区内,不同的是小型群体的群聚性稍大(图8)。较高层次上的群聚性体现仍然很弱。那14个界定清楚的红山文化大型群体和社区代表了新出现的结构。社会融合更强的大型群体和社区所具有的中心性力量在红山文化时期比在兴隆洼文化或赵宝沟文化时期更加明显。

在上述红山文化时期赤峰地区的 14 个大型群体及社区的人口底限为 150 人,上限不超过 1 000 人。在很多群体中,我们都可识别出一个在这个群聚中最大的单个的小型群体。对各个群体和社区的面积进行排列的曲线图 (图 9) 几乎都显示了直线形或凹线形 (即独霸模式),二者都反映了中心化了的社会单位。但是整个调查区内红山文化时期全部小型群体的面积排列图则呈明显的凸线形 (图 10)。在聚落分析中,这通常反映了此区中存在很多独立的、未被吸入任何一个层次高一点的中心的社会单位。

这样我们在聚落形态图上直接看到了从前只能从不太直接的证据中假设其存在的群体。这种群体可能是随着诸如玉雕及其他艺术品的专门化生产的出现和经济上相互依赖性的增强而产生的。公共建筑的出现说明了这些群体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已对此产生了需求,而且说明他们能够提供建设所需的人力。这些群体有可能是按照社会等级原则组建起来的。但是,本文中所具体描绘的那些特定的赤峰地区较大型群体及社区是否也有这种公共建筑和社会等级排列还有待通过考古

发掘来验证,因为在地表进行的采集无法直接找到说明这种特征的证据。然而,在上述调查区域 以西的地区,在红山文化遗址的地表上,发现了一些保存在地表的石头建筑[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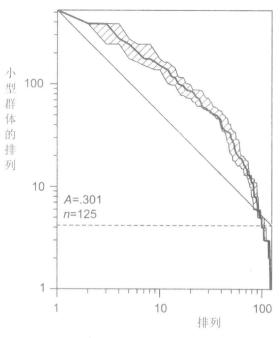


图 9 位于每个大型红山文化群体(或社区) 中的小型群体的面积排列曲线图

图 10 赤峰调查区内红山文化时期 全部小型群体的面积排列图

哥伦比亚安第斯山的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

哥伦比亚马格达雷那高地(Alto Magdalena)地区(图 1)的史前人口集中于海拔相对较高的地方(海拔 1 400-2 400 米)。该地区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凉爽,同时由于离赤道较近,一年四季温度变化极小。丰富的降雨使当地的热带雨林长势旺盛。尽管降雨有其不确定性,但干旱极为罕见,一年四季皆可耕作。主要的农业障碍来自于降雨过度造成的水涝和开林垦荒引起的陡坡上水土流失。陡坡及植被也给考古调查带来了一些困难,雨林及草皮覆盖的牧场干扰了遗物采集的地表能见度。有时还需在调查中进行小规模的试掘来代替地表采集,以此来确定某一地点是否有遗物并在有遗物的情况下提取样品。

在该地域的古典时期(Regional Classic Period, 距今 2 000-1 100 年),复杂社会组织在考古上体现为建造精致的墓葬,在墓葬周围多环绕着描绘着人、动物或超自然形象的巨大石像[32-38]。显然,只有极重要的人物才能在死后享此殊荣。但是,就像对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的了解一样,我们对这些墓主人特殊地位的实质还一无所知。南美洲北部很多史前墓葬都随葬大量的作为祭品的私人财物,但在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的墓葬中,这种财物并不丰厚。鉴于这一特征,再考虑到他们在建筑雕刻上的精工细作及墓葬周围那些亘古不朽的石像,可以推测这些墓主人的社会等级多取决于个人象征意义上的或在宗教礼仪上的威望,而不是其财富的积累[39]。

从 1984 年开始,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考古项目组在四个不相连的地区,总面积达 8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采集了与聚落形态有关的信息 [39-44]。这里我们将重点研究其中一个面积达 317 平方公里的地区。古典时期这一地区的人口总数约在 7 000-14 000 人之间,多于红山文化时期在更大面积的赤峰调查地区内的人口数量 (4 000-8 000 人)。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0-49 人—远远太于赤峰调查地区内红山文化时期的人口密度 (5-10 人/平方公里)。其人口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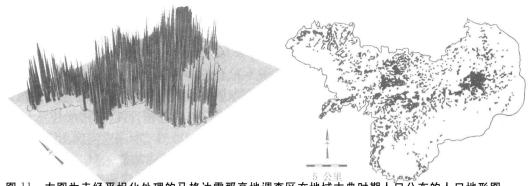


图 11 左图为未经平坦化处理的马格达雷那高地调查区在地域古典时期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 右图根据地域古典时期遗物发现地点图而绘制

该地区古典时期的遗址分布(图11)同红山文化时期的赤峰地区完全不同。在赤峰地区, 聚落数量不多且相当紧凑,周围有大面积的未居住地;而在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遗址广阔地散 布蔓延。在调查区内, 古典时期遗存见于全部面积的 7.3%, 而在赤峰调查区内的红山文化时期 遗存仅见于全部面积的 0.3%, 两者对比鲜明。当以地形图的方式来观察古典时期的聚落分布 时,很难像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那样勾画出一些小型群体。尽管一些遗址高峰的基底小而彼此 分开,但另一些高峰则融合在一起,其合并起来的基底不规则地、而又无明显断层地延伸在约2 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如上所述,在赤峰地区可以清楚地看出红山文化时期的小型群体非常小,群 体内居民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可能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而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则与之相反, 这里的家庭大多没有形成聚集于某一地点的群体,我们几乎无法在古典时期居住址遗存的空间分 布上鉴别出这样的群体的存在。因此古典时期该地区各家庭之间在一个个小型群体之内的社会交 流可能不是特别频繁。古典时期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较大的毗连的遗址从一端到另一端近3公 里,这样的距离过远,无法推动紧密的交流。通过对古典时期遗址的发掘 [45],我们发现其居 住零散,各个家庭就居住在他们种植玉米、豆类、南瓜、土豆及其他作物的土地上。即使在居住 比较稠密的地点,房子之间的土地也是最主要的农田。这种居住模式同现在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 居住模式相似,今天人们仍住在他们所拥有和耕种的土地上。而另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 形态也类似于当今赤峰地区的聚落形态,即所有的家庭很紧凑的居住在各个村庄内,大片农田将 这些村庄分隔,所不同的只是红山文化时期的村庄小于现代村落,也没有现代的紧凑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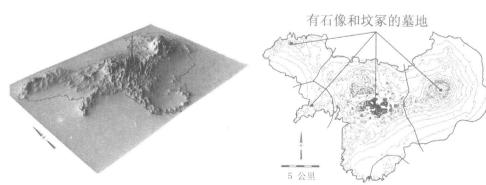


图 12 左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马格达雷那高地调查区在地域古典时期的 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右图为体现该地区社区划分的等高线图

在我们的人,我们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人,

成的聚落的特征。像红山文化时期那样的小型群体在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的聚落分布中,只见于人口最为稀少的边缘地带,多数情况都是那些庞大的居住群在广阔的地域里没有任何

规律的散布,看不出存在着小规模的空间结构。像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那样,我们也可通过一个"平坦化"了的人口地形图来观看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的聚落分布(图 12)。在此图上,那些在未经"平坦化"处理的图上可见到的大量微小的山峰,现已融会成 2 个高的和 3 个稍低的密集遗址的"小山"。与红山文化时期的"平坦化"图不同的是,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遗址分布得非常广泛,以至于在调查区内任何一个部分都看不到有未居住的平坦地表。相反,整个地区都显示了像赤峰地区东南部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分布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我们可以使用居住"低谷"的方法来识别社区。代表古典时期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的这些遗址的"低谷"勾勒出了 2 个大的、相对完整的社区(图 12),以及其他 3 个没有被完全包括在调查区内的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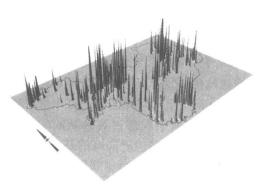


图 13 未经平坦化处理的马格达雷那高地调查区在形成期一期的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在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可将这种较大规模的空间布局模式阐释为领土意义上的群体或社区。这2个相对完整的社区和3个没有被完全包括进调查区的社区中的2个都各有一块包括石像和坟冢的墓地,暗示了该地点可能是各自社区里的某种礼仪活动的中心。这些社区的社会政治特性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的葬礼中得到了创造与保持,同时,它还体现在为进行礼仪活动而在其墓葬周围所建的广场和石像上。同样可以想象,在赤峰调查区以外发现的那些具有礼仪中心特征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可能对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区具有一种社会向心力的作用。不过目前这种礼仪中心在赤峰

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社区的存在还有待证明。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的社区无法通过聚落面积直方图或者面积排列曲线图来研究,因为我们无法有意义地划分出任何组成构建社区的社会基本单位的小规模群体,从而无法得到一种有意义的分析单位以作为分析的基础。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的社区比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社区要大,从一端到另一端有10-12公里,而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区只有4-6公里。马格达雷那地区的社区人口也显著多于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区人口,那2个相对完整的社区各有几千居民(可能多达 $7\,000$ 人),而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区不足 $1\,00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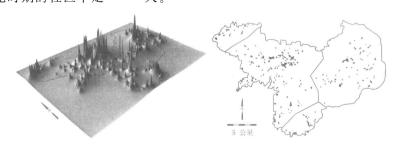


图 14 左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马格达雷那高地调查区在形成期一期的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右图为体现该地区社区划分的等高线图

古典时期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聚落形态的前身,要追溯到距今约 3 000 年前刚建立农业生活方式的时期,在属于形成期一期 (the Formative 1 period) 的最早的定居遗址比古典时期的遗址小得多,那时农业的出现还不到 400 年,其人口已达至少 1 500 人。尽管当时人口比后来少得多中仍从1 的分布却很难划分出小型群体,即使未经"平坦化"处理的人口地形图 (图 13)

也对此无补。图上虽可见到一些孤立的人口"高峰",但多数高峰都融会在一起,尤其在4个主 要区域内。像在古典时期那样,空间结构在更"平坦"的图上显示最明显,图 14 上的波浪式起 伏显示了可能存在3个或4个社区(图14)。尽管其人口较古典时期少得多,但2个几乎被全部 包括进调查区的社区的面积与后来古典时期社区的面积相近。这个较大规模的空间结构的基本特 点自定居生活之始便见于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的聚落形态中。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人口确有增 长,而社会向心力也把人口更紧密地吸向中心,即可能是由坟墓和石像构成的举行仪式的中心, 形成于区域古典时期或稍前。与红山文化时期赤峰地区的大型群体和社区不同的是,马格达雷那 高地地区的群体和社区没有在序列的某一点上,作为由在前期已存在的小的基本单位组成的大的 社会空间结构出现。

墨西哥高地南部的奥哈卡山谷



图 15 奥哈卡山谷 Rosario 时期的死尸浮雕

下面我们要讨论聚落形态序列中的第三个比较对象 ——墨西哥高地南部的奥哈卡 (Oaxaca) 山谷。奥哈卡 山谷宽阔平坦, 有淤积层, 海拔高度约为 1 500 米。这 种海拔高度,加之其位于热带的纬度,造成了它夏暖 (但不热) 冬凉(仅有偶尔的霜冻)的气候。其降雨量大 大少于马格达雷那高地地区, 而与赤峰相近。几乎完全 局限于夏季的降雨对山谷底地肥土上的农业来说颇为丰 足,尽管运河灌溉增加了农业产量,降低了山麓土薄所 带来的风险性。广而言之,这里的环境同马格达雷那高 地大为不同, 而与赤峰相近, 尽管其冬天没有赤峰冷, 夏季也没有赤峰热,而且山谷四周的山也更陡、更湿润。

在奥哈卡山谷,早期酋长制在考古上的证据不如在 马格达雷那高地那么显而易见, 其出现也不像红山文化 时期那样明显地与一个单个时期相关联。这里定居农 业生活方式开始于距今约 3 500 年前。当时人们生活在茅草房屋的村庄里,与现今当地的一些村

图 16 左图为未经平坦化处理的奥哈卡地区 Rosario 时期的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右图为描绘遗址高峰的基底和周围遗址聚合成小型群体的等高线图

别「47 - 50]。 定居农业开始 300 年后, 此 地的墓葬已表 现出明显的社 会等级区别, 有些墓主人无 任何随葬品, 另一些墓主人 则随葬了诸如 陶器、小塑像 及由贝壳、磁

庄并无太大差

铁矿石、玉及其他材料制成的装饰品。地位最高的家庭住在建筑于平台之上的、比其他房子大 得多的而且有石头墙的房子里。一些家庭非全职性地从事几种手工业品的生产,他们的住房 经常紧挨着地位高的家庭[51-53]。这些体现复杂社会组织的标志特征出现缓慢,但在为期 段时间内(划分成三个考古时期: San José、Guadalupe 和 Rosario)得到了强化。在 这段时期的末期,一块刻有一具死尸浮雕和一个名符(图 15)的石板被置放在广场中,这个广场位于现在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最为威严的房子前面,以至于每个进入广场的人都得从它上面走过,不偏不倚地直接踩在死尸浮雕上[52],这表明地位高的人物对其下级从属者有很大的强制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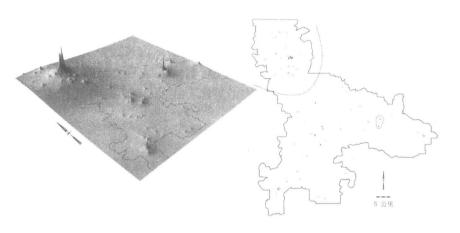


图 17 左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奥哈卡地区 Rosario 时期的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右图为描绘该区遗址高峰基底的等高线图

在20世奥落十包卡与脉平围关数。在代谷目地奥地的125范有的了态明地。125范有的了态有的引流。147

Rosario 时期(开始于距今 2 700-2 500 年),整个调查区内人口不超过 2 500 人,可能也不低于 1 000 人,其人口密度(0.5-1.2 人/平方公里)大大低于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或赤峰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人口密度。此地农业技术虽很简单,但人口供养能力大大超过了 Rosario 时期的微小需求。代表 Rosario 时期人口分布的未经"平坦化"处理的人口地形图(图 16),同赤峰红山文化时期人口地形图相似,而与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人口地形图形成对比。在马格达雷那高地图上,可以识别出 65 个小型群体,大多都是单个的毗连在一起的遗址,间或有 2 个甚至 3 个相邻的聚落合并在一起。其中 1 个群体和其他群体有惊人的不同之处。在这儿,8 个空间上并不毗连的遗址群聚在一起,其人口总数在 400-800 之间。这相当于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小型群体人口数,远超过任何一个 Rosario 时期的小型群体人口数。在赤峰和奥哈卡,从考古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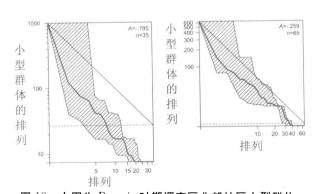


图 18 左图为 Rosario 时期调查区北部社区小型群体 面积排列曲线图;右图为奥哈卡山谷调查区所有的 小型群体的面积排列曲线图 (Drennan and Peterson 2003)

的聚落形态数据可以容易地看出小型群体人们之间有着日常的面对面的交流联系,但在马格达雷那高地,无证据显示这样的小型群体起到了构成小规模社会空间的作用。在赤峰,几个这样的小型群体明显大于其他的群体,而在奥哈卡仅有1个单独群体一枝独秀。Rosario时期的极易识别的小型群体自最早的定居生活之初便已存在,而1个单独的、较大的小型群体约在定居生活开始300年之后(远在Rosario时期之前)出现。在较大比例上的平坦化了的奥哈卡

人口地形图上可见其群体的群聚性,但其模式与赤峰的或马格达雷那高地的有惊人的不同(图 17)。此图的最主要特点是只有 1 个单峰突起在很平坦的地平线上,在地平线上点缀着很多分开来的、比这个单峰小得多的山峰。这个单峰的较低的坡面上包含了众多的、代表外围聚落的小山峰,但在调查区的其他地方,极少见到小型群体的群聚。在调查区北部此单峰自成一个社区,囊

括了环绕这个极大的群体周围的 30 个小型群体。总而言之,这个社区囊括了此区域人口总数的一半。因为地形图上没有显示出将这些山峰分隔开的遗址低谷,因此我们无法将此社区细分成更小的单位。此社区宽约 20 公里,明显的比红山或马格达雷那高地的社区大,但其人口(600—1400人)与最大的红山社区人口相当,比马格达雷那高地社区人口少得多。这个区内的各个小型群体的面积排列曲线图同整个调查区的面积排列曲线图无大差别(图 18),两者都显示了极强的独霸模式(primate pattern),说明了此社区内部以其最大的群体为中心,而这个群体在人口方面称雄。这点与赤峰和马格达雷那高地明显不同。在赤峰和马格达雷那高地,多个大型群体和较大规模的社区分享他们所处的地域。Rosario 时期聚落形态的一些特点已见于先它之前的时期中,尤其是在界定清楚的小型群体中,而这些群体的存在可追溯到定居生活之初。一个单个的比其他群体都大得多的小型群体的出现可见于曲线的从凸到凹(即独霸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发生于定居生活开始 300 年之后,远在 Rosario 时期之前。

三个地区的早期酋长制群体的比较

在上述三个地区中,一些大体很相似的社会变革都发生在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建立后的一两千年内。最初的农业聚落发展成了人口更多、占地更大、包含更广的群体,有等级区别的社会制度成为这些群体的重要组织原则。对这些群体聚落形态的比较研究展示了它们之间性质上和发展轨道上的不同。在这三个地区中,都可见到一些与其他聚落不相连的、只包括一两户家庭的小农庄。再加上通过考古发掘对一些个别的遗址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证明了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是一个基本社会单位。但大多数人口不是住在孤立的、只包括一两个家庭的农庄上,而是就近与大多数其他家庭结邻而居。三个地区自定居生活之初便都是如此。在赤峰和奥哈卡,大小不同的小型群体(通常包括 5—15 个家庭)与其他群体明显地分开,极易识别。一个奥哈卡的小型群体和几个赤峰群体居大,包括了至少 100 户家庭。在马格达雷那高地,人口密度较高,家家户户都相距不远,但通过聚落分布的形态无法鉴别出单独的小型群体。这可能反映了其社会交往联系比极易识别的赤峰和奥哈卡的小型群体更广而不集中。

如果赤峰和奥哈卡的小型群体是较强的社会交流的产物,或者说社会交流是小型群体的产物,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种交流的实质以及它与马格达雷那高地的广泛而不集中的社会交流的区别。一种可能是,在赤峰和奥哈卡,人们之间的经济上的交流也极其频繁。在奥哈卡,工具和生产废料集中在不同家庭直接表明了其经济的专门化。尽管绝大多数家庭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他们也以家庭为单位专门生产实用品和奢侈品,这包括陶器、骨器、石器、布匹和由贝壳、玉或其他材料制成的装饰品 [53]。尽管我们还不了解在小型群体之内,这些物品在家家户户间的确切的交换机制,但显而易见,这种交换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尤其在小型群体之内的家庭之间的交流。在红山文化时期,彩陶之精及玉雕之巧都暗示了它们一定出自专门匠人之手。但我们还无直接证据证明其生产地点和组织方式,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单纯制造实用品。在马格达雷那高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家庭式生产活动的实质和范围,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经济的专门化[40] [45]。在马格达雷那高地,形成日常面对面交流的经济基础可能不像在赤峰和奥哈卡那样发达,而这和其交流联系的明显不集中性有关。

另一个和融合紧密、极容易识别的小型群体的形成有关的变量也涉及到经济,即土地使用权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今天的马格达雷那高地有两种极其不同的聚落形态。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地区,现今的聚落形态和古代一样分散。如今,大多数家庭住在他们所拥有和耕种的土地上,其住宅广阔地散布在农田上。但是在海拔低得多的地方,大多数的居民住在紧凑的村庄里,周围是没有任何房屋的大片农田。这些土地被分成大块私田,为少数几个家庭所有,由雇工耕作。雇工及其家人住在紧凑的村庄里。在奥哈卡和赤峰,可能在农业生活之初,土地的使用和耕种就已

掌握在比家庭大的社会组织(小型群体)的手中了。今天,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是如此组织 起来的。这两个地区现今的聚落形态显示了极其容易识别的小型群体周围仍为大片无房舍的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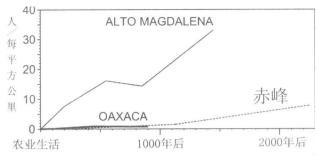


图 19 自定居农业生活开始至酋长制时期三个地区 (红山时期的赤峰, Rosario 时期的奥哈卡和地域 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的人口密度变化

所环绕。同样地,极其容易识别的小型群体 在马格达雷那高地没有出现这一事实,显示 了其土地的使用和耕种是以家庭而不是以群 体为单位组织起来的。

长期以来我们就知道人口规模及密度与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有广义上的关联:社会愈复杂,人口则愈多,密度也愈大 [54]。人口增长是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社会复杂性增强的主导因素。这三个地区在转向农业生活后人口都有显著增长,但仔细比较,三者也有差异(图 19)。在迄今口密度是赤峰或奥哈卡的 10 倍。这本已很高

所知的最早的农业聚落时期,马格达雷那高地的人口密度是赤峰或奥哈卡的 10 倍。这本已很高的人口密度在增长速度上,亦较其他两个地区迅猛。在赤峰,人口密度起步低,增长缓慢,尽管在红山文化时期,它已超过 Rosario 时期的奥哈卡。在奥哈卡,在农业开始后的三四百年内,人口密度处于长势,已有证据显示一个很大的、有显著社会区别的群体的存在。随着这个群体的扩大,其社会组织也在接下来的 500 年间变得更复杂、更加等级化,尽管其人口密度并无增长。Rosario 时期的奥哈卡社会发展虽迅捷,但其人口密度很低,而且一定时期后,人口密度就停止了增长。红山社会无疑是这三个比较对象中最古老的一个,但其在农业生活开始后的发展却最为缓慢。在马格达雷那高地,尽管小型群体无法得到识别,但已有证据显示在定居生活方式开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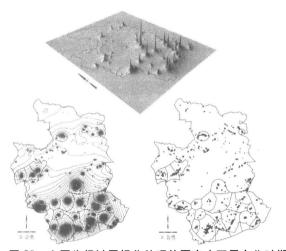


图 20 上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 赤峰地区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左下图为体现该区社 区划分的等高线图;右下图体现由小型群体聚合为社区

久,大型群体或社区就已存在,其社会组织亦持续变得更加复杂,如此一直持续到古典时期。马格达雷那高地发展之迅速与其人口密度之高和人口增长之快有关。红山和 Rosario 时期的大型群体在人口规模上相似,都小于古典时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但马格达雷那高地人口规模虽大,却没有与之相伴的、更复杂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事实上,无论葬于马格达雷那高地墓地的人物如何声名显赫,马格达雷那高地经济的专门化和相互依赖性都没有另两个地区强。

需指出的是,依考古证据所做的人口估计 仅是粗略估算,但因为这三个地区的差异程度 要比人口估算误差范围大得多,所以即使人口 估算以后得到修正,比较研究的结论也不会因

继后时期的发展

尽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比较三个地区最早的等级社会——酋长制社会,但我们不妨以对这三个地区在继此之后时期的发展的简述来结束此文。就赤峰而言,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发生在红山文化末期的过渡时期的情况,但是到距今约 4 200 年前,上述赤峰调查区的 14 个红山大型群体和

此改变。

社区已被 21 个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大型群体和社区所取代 (图 20)。从空间上讲,夏家店下层 文化时期社区的面积规模与红山文化大致相当,但它的每个社区都包括了比一个红山文化社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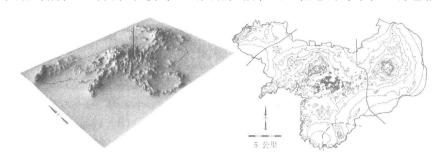


图 21 左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马格达雷那高地调查区近代期人口 分布的人口地形图:右图为体现该区社区划分的等高线图

几倍的人口。这些群体 的内部组织也有变化 [7-8], 这从大型建筑, 尤其是建在偏远山顶上 的石城的显著增多可见 一斑。这些石城可能是 当地人们用来逃避战乱 的避难所。夏家店下层 文化时期的大型群体, 正如在此之前的红山文

化的大型群体一样,包括一些极易识别的小型群体。因此,这种将小规模社会交流模式化的方法 的重要性并没有改变。在马格达雷那高地,古典时期的社区尽管人口略增,但未经变化地持续到 了接下来的近代期(图 21)。重要人物已不葬在有石像环绕的巨墓中,而是葬于深深的竖井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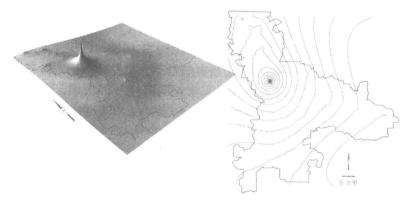


图 22 左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奥哈卡山谷 Monte Albán II 时期 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右图为此区的遗址等高线图

葬中, 其中祭品的数目较前期 稍多。这可能暗示: 古典时期 社会等级区别体现在超自然活 动上,象征意义浓:而后来的 社会等级区别则建立在更大的 个人财富的积累上[39]。目前 尚不清楚继古典时期之后,经 济组织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 其聚落分布仍极为分散,各户 家庭也未归组成小型群体。继 Rosario 时期之后, 奥哈卡山谷 继续为一个单个的大的中心所

控制(图 22)。这个中心是个新建的小镇或小城,其人口迅速增加至 20 000 甚至更多。对这个城镇 的军事征服被刻于石头上[5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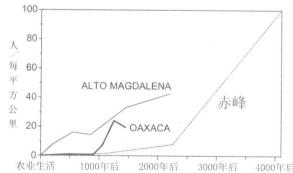


图 23 自定居农业生活之初至酋长制之后的三个地区 (夏家店下层时期的赤峰, Monte Albán II 时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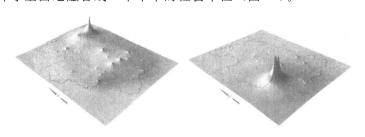
奥哈卡, 近代期的马格达雷那高地) 的人口密度变化

赤峰和奥哈卡的社会变革继续其复杂化 轨道。在这两个地区,都可见到一些官僚和 政治活动的证据:通常这些活动都被用来作 为衡量是否有国家级组织存在的标准。相对 来讲, 在马格达雷那高地, 继古典时期后, 社会政治组织的变化不大。赤峰和奥哈卡地 区有较大的组织变化与这两个地区人口增长 4000年后最大相对应,而马格达雷那高地的不大的组 织变革正与其不大的人口增长相对应

著高于奥哈卡山谷的人口密度。从奥哈卡山

(图 23)。马格达雷那高地的人口密度继续显

谷出现了三个地区中最大的、也可能是最复杂的社会实体。同其他两个地区相比,赤峰的变革 步伐仍旧迟缓。我们所讨论的赤峰地区在时间跨度上纵横4000年,而马格达雷那高地跨越 2 200年, 奧哈卡跨越 1 500 年。奧哈卡山谷继 Rosario 时期之后,继续像从前一样被一个单独的社会政治单位所控制,而马格达雷那高地和赤峰都被分隔成多个社会政治单位,没有一个在空间上或在人口上显著大于其邻者。最终直到很晚时期,即到战国一汉和辽代,随着外来势力对赤峰地区的侵入,赤峰才全面地融合成一个单个的社会单位(图 24)。



图左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战国—汉时期赤峰地区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右图为经过平坦化处理的辽代前后赤峰地区人口分布的人口地形图

结 论

从简单平均化的模式中脱胎而出的、具有大规模社会政治融合的酋长制社会,在世界各地均有反复而独立的出现。在本文中,我们用三个地区来对此举例说明。这三个地区在空间上相隔非常之远,无法彼此发生联系或对彼此产生影响。尽管它们的发展过程大致相当,但在这三个地区中,大体类似的转变却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从而导致了三个各具特色的等级社会的出现。本文侧重研究最初的、大规模的、以等级制度原则组织起来的群体(酋长制群体)的出现,而其发展轨道的早期阶段明显地为后来的、较大的、更复杂的政治实体(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通过地域性聚落分析,我们得以描述三个比较对象之异同,尤其侧重于它们在不同规模上的人口和社会组织的异同。极其容易识别的小型群体在赤峰和奥哈卡的存在和在马格达雷那高地的缺失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在小型群体层次上做进一步研究。这种研究将需要一种比地域性调查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形式及发掘,以了解各个家庭的活动,并考察是什么样的社会交流将这些家庭融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团体。

附记:在此我们特别感谢 Stephen Kowalewski 为我们提供有关奥哈卡山谷调查区的电子数据,感谢 Gideon Shelach 对本文初稿的审阅。此外,感谢张丽华将此文从英文译成中文以及 Gregory Indrisano 对专有名词的翻译所提出的字贵意见。

参考文献:

- [1] Barnes Gina L.. China, Korea, and Japa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 [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3.
- [2]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Guo Dashun. Hongshan and Related Cultures [A]. Sarah M. Nelson. In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ast China: Beyond the Great Wall [C]. London: Routledge, 1995.
- [4] Nelson Sarah M.. The Neolithic of Northeastern China and Korea [J]. Antiquity, 1990, (64).
- [5] Nelson Sarah M..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North China [J]. Sino-Platonic Papers, 1994, (63).
- [6] Nelson Sarah M.. Hongshan: An Early Complex Society in Northeast China [A]. Peter Bellwood, Dianne Tilloson. Indo-Pacific Prehistory [C].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7.
- [7] Shelach Gideon. A Settlement Pattern Study in Northeast China: Results and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Theory and Methods to Chinese Archaeology [J]. Antiquity, 1997, (71).

• 28 •

- [8] Shelach Gideon. Leadership Strategies,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Social Complexity in Northeast China [M].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1999.
- [9] Childs-Johnson Elizabeth. Jade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The Dragon and Fertility Cult Worship [J]. Arts Asiatiques, 1991, (46).
- [10] Chiou-Peng Tze-Huey. Jade Carving in Neolithic China: A Review of Recent Discoveries [A]. J. J. Lally. Archaic Chinese Bronzes, Jades, and Works of Art [C]. New York, 1994.
- [11] Guo Dashun. Understanding the Burial Ritual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Through Jade [A]. Rosemary E. Scott. Chinese Jades [C]. London: Percival O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7.
- [1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红山文化与玉器精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13] Barnes Gina L., Guo Dashun. The Ritual Landscape of "Boar Mountain" Basin: The Niuheliang Site Complex of Northeastern China [J]. World Archaeology, 1996, (2).
- [14]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11).
- [15]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J],文物,1984,(6).
- [1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 [J]. 文物, 1986, (8).
- [17] Nelson Sarah M..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Early State in Northeast China [A]. Henri J. M. Claessen, Jarich G. Oosten.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C], Leiden: Brill, 1996.
- [18]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19] 赤峰联合考古调查队. 内蒙古赤峰地区 1999 年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 [J]. 考古, 2003, (5).
- [20] Linduff Katheryn M., Robert D. Drennan, Gideon Shelach. Early Complex Societies in NE China: The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J].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002—2004, (1-2).
- [21] 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 内蒙古赤峰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 (1999-2001) [A]. 边疆考古研究 (一)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 [22] Hamada Kosaku, Mizuno Seiichi. Chifeng Hongshanhou [M]. Archaeologia Orientalis, Series A, No. 6. Tokyo: Far Eastern Archaeology Society of Japan, 1938.
- [23] 李恭笃. 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 [J]. 考古, 1986, (6).
- [2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 [A].李逸友,魏 坚.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一) [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 [2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A]. 李逸友, 魏 坚. 内蒙古文物 考古文集(一)[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 [2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 [A]. 魏 坚.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二)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27] 田广金,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1,2合刊).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79,(2).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 [J]. 考古学报, 1982, (2).
- [30] 朱延平,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 [C],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 [31] Drennan Robert D., Christian E. Peterson. Comparing Archaeological Settlement Systems with Rank-Size Graphs: A Measure of Shape and Statistical Confidence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待刊.
- [32] Duque Gómez Luis. Exploraciones Arqueológicas en San Agustín [A]. Revista Colombiana de Antropología,
- Suplemento No. 1 [C]. Bogotá : Imprenta Nacional, 1964.

 [33] Duque Gómez, Luis, Julio César Cubillos. Arqueología de San Agustín: Alto de los Idolos, Montículos y Tumbas [A].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Arqueológicas Nacionales del Banco de la República [C]. Bogotá, 1979.
- [34] Duque Gómez, Luis, Julio César Cubillos. Arqueología de San Agustín: Exploracionesy Trabajos de Reconstrucción en las Mesitas A y B [A].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Arqueológicas Nacionales del Banco de

de Investigaciones Arqueológicas Nacionales del Banco de la República [C]. Bogotá, 1988 [36] Cubillos, Julio César, Arqueología de San Agustín: El Estrecho, El Parador, y Mesita C [A], Fundación de Investigaciones Arqueológicas Nacionales del Banco de la República [C]. Bogotá, 1980 [37] Reichel-Dolmatoff, Gerardo. San Agust n; A Culture of Colombia [M]. New York: Praeger, 1972.

[35] Duque Gómez, Luis, Julio César Cubillos. Arqueología de San Agustín: Alto de Lavapatas [A]. Fundación

- [38] Llanos Vargas, H ctor. Los Chamanes Jaguares de San Agust n. G nesis de un Pensamiento Mitopo tico [M]. Santaf de Bogotá: H. Llanos Vargas, 1995.
- [39] Drennan Robert D.. Mortuary Practices in the Alto Magdalena: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San Agust n Culture" [A]. Tom D. Dillehay. Tombs for the Living: Andean Mortuary Practices [C]. Washington, D. C.:
- Dumbarton Oaks, 1995. [40] Drennan Robert D., Las Sociedades Prehispánicas del Alto Magdalena [A]. Instituto Colombiano de
-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C]. Bogotá, 2000.
- [41] Drennan Robert D., Dale W. Quattrin. Social Inequality and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Valle de la Plata, Colombia [A]. Gary M. Feinman, T. Douglas Price.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equality [C].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5.

[42] Drennan Robert D., Mary M. Taft, Carlos A. Uribe. Prehispanic Chiefdoms in the Valle de la Plata, Vol.

- 2: Ceramics-Chronology and Craft Production [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moirs in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No. 5 [C]. Pittsburgh, 1993. [43] Drennan Robert D., Luis Gonzalo Jaramillo, Elizabeth Ramos, Carlos Augusto Sánchez, María Angela
- Ramírez, Carlos A. Uribe. Regional Dynamics of Chiefdoms in the Valle de la Plata, Colombia [J].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91, (18). [44] Herrera, Luisa Fernanda, Robert D. Drennan, Carlos A. Uribe. Prehispanic Chiefdoms in the Valle de la
- Plata [A]. Vol. 1: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Human Habitation [C].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moirs in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1998. [45] González Fernández Víctor. Prehispanic Change in the Mesitas Community: Docum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 a Chiefdom's Central Place in San Agustín, Colombia [D]. U. 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8. [46] Peterson Christian E., Robert D. Drennan. Identifying Communities: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trategies

for Archaeological Survey [J].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

- chaeology, March 31 April 4, Montreal, 2004. [47] Blanton Richard E., Stephen Kowalewski, Gary Feinman, Jill Appel. Monte Albán's Hinterland, Part I: The Prehispanic Settlement Patterns of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s of the Valley of Oaxaca, Mexico [J].
-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15). [48] Flannery Kent V.. The Tierras Largas Phase and the Analytical Units of the Early Oaxacan Village [A].
- Kent V. Flannery, Joyce Marcus. The Cloud People: 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Mixtec Civilization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 [49] Kowalewski Stephen A., Gary M. Feinman, Laura Finsten, Richard E. Blanton, Linda M. Nicholas. Monte Albán's Hinterland, Part II: Prehispan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lacolula, Etla, and Ocotlán, the Valley of Oaxaca, Mexico [J]. Memoi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89, (23).
- [50] Winter Marcus C.. The Archaeological Household Cluster in the Valley of Oaxaca [A]. Kent V. Flannery.
- The Early Mesoamerican Village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51] Drennan Robert D., Kent V. Flannery. The Growth of Site Hierarchies in the Valley of Oaxaca: Part II
 - [A]. Kent V. Flannery , Joyce Marcus. The Cloud People: 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Mixtec Civilization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 [52] Flannery Kent V., Joyce Marcus. The Growth of Site Hierarchies in the Valley of Oaxaca, Part I [A]. Kent V. Flannery, Joyce Marcus. The Cloud People: 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Mixtec Civili
 - zation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 30 •

- [53] Flannery Kent V., Marcus C. Winter. Analyzing Household Activities [A]. Kent V. Flannery. The Early Mesoamerican Village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 [54] Carneiro Robert L.. From Autonomous Villages to the State, a Numerical Estimation [A]. Brian Spooner. Population Growth: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 [55] Blanton Richard E.. Monte Albán: Settlement Patterns at the Ancient Zapotec Capital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 [56] Flannery Kent V., Joyce Marcus. The Earliest Public Buildings, Tombs, and Monuments at Monte Albán, with Notes on the Internal Chronology of Period I [A]. Kent V. Flannery, Joyce Marcus. The Cloud People: 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Mixtee Civilization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 [57] Marcus Joyce. The Conquest Slabs of Building J, Monte Albán [A]. Kent V. Flannery, Joyce Marcus. The Cloud People: 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Mixtee Civilization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责任编辑: 刘文山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ettlement Pattern Of Early Chiefdom Communities: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Northern Andes and Mesoamerica

Robert D. Drennan, Christian E. Peters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15620, U. S. A.)

Abstract: No early chiefdom society was exactly like that of another region, but all represented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permanent hierarchical social relations in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In these societies, those who would be chiefs were successful enough at forging unequal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ir own communities that the fundamental organizing principles of those communities were transformed. The communities involved in this transformation existed at varying social and spatial scales: we commonly think of small local communities composed of those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 on a daily basis nested within higher order communities, which were sometimes nested within yet larger communiti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emergence of chiefdoms is marked by the emergence of larger, more tightly integrated communities than had existed previously. Settlement pattern research on a regional scal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delineate and compare these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are reflected in the way human settlement is distributed across the landscape at a given time. Comparison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records for the Chifeng, the Alto Magdalena (Colombia) and the Valley of Oaxaca (Mexico) shows that chiefdom communities emerged under conditions of especially low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feng and Oaxaca, and their development was especially rapid in Oaxaca and the Alto Magdalena. It appears that interaction patterns were structured much more strongly around small local communities in Chifeng and Oaxaca than in the Alto Magdalena. It was also in Chifeng and Oaxaca that chiefdoms were succeeded eventually by large integrated state-level organization, whereas this did not occur in the Alto Magdalena sequence.

Key words: Chifeng area; Alto Magdalena; Oaxaca; Early chiefdoms; Settlement patterns; Social organization